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此事引起上海群情激愤。如果以当代的眼光、视角来审视这起案件，本身是一起涉外案件。然而，犯案者是美国商船的水手，与英国驻沪领事也没啥关系。但放在当时来说，最终此事由当时在上海城里西洋人中首屈一指说了算的巴富尔出面解决——将受伤的孩子交由英国领事馆的医生哈勒诊治，在视力有所恢复的前提下，募捐200元钱，请道台买了一块地，以赔偿伤者；同时制订鸟枪管理条例，对打猎做出详细规定。

上图：位于杨浦区的地铁18号线丹阳路站，衔接杨浦滨江与百年水厂，站厅陈列许多历史记忆影像。
摄影 / 姜浩峰

时隔近一年，另一起案子让宫慕久下定决心完成他的华洋隔离之法。当时，上海同知和知县给巴富尔送来一封信，历数英国人种种出格的事情，并称本地政府已抓捕一名姚姓中国教徒，原因是这名教徒在鸦片战争时帮助英国人担任翻译。巴富尔当然不依不饶，在领馆降下英国旗，号称领馆人员将迅速撤离上海，并称他的撤离将由英军予以协助。此事最终由宫慕久登门致歉而了结。之后，宫慕久为了力求避免中英之间的直接冲突，于1845年亦即上海开埠两周年之际，将一份《上海土地章程》送到西姚家弄英国领事馆。1845年11月29日，双方签署章程。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曾在《海纳百川上海源》一书中提及，“根据这个章程，划定东面到黄浦江，南面到洋泾浜，北面到李家场，面积共830亩的地方，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这就形成了英租界”。葛剑雄还特别提到，“我们一般称为租界，英国人自己称为‘settlement’，居民点”。而根据章程，每亩地的租金统一为每年1500文铜钱。如果单单看这份章程，可谓含有宫慕久的苦心——总算将英国人以及几乎所有西洋人隔离到上海县城之外了。其规定中国人不得自租界建房、租房，而外商单户租地不得太大，更不可囤地甚至租而不用。

然而，时隔不多久，“租界”也好，“居留地”也罢，反正章程所定、宫慕久所想的许多美好都被打破——1848年11月，英租界已经扩大到2820亩，西面已经到了今天的西藏路，北面到苏州河。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江南一带死亡人口达7000万人，南京以及江南一带的有钱人纷纷逃往上海。19世纪50年代小刀会起义一度占领上海县城，城中人口从35万锐减到4万——原本县城里的来自各地的中国人纷纷涌入租界，彻底打破了华洋隔离的状态。“从1860年开始，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上海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战事。整个上海得到了很大发展。”熊月之告诉记者，“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意外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外利益共同体’。也因为这一共同体的存在，而使得上海有了较长一个阶段的发展空间。治外法权、租界存在、战时中立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政治前提，上海开埠、华洋混处则是其中最原初也是最关键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共同体明显地呈现出西强中弱、西主中辅的特点，折射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处境。”

熊月之进一步指出，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这些晚清重臣无一例外都不希望上海的租界出现战事。原因在于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这些人主导了不少重要产业入驻上海，他们和来自江南等地的一些有钱人都有投资在这里。熊月之甚至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上海——“上海，成为江南人的命根子”。在甲午战争之前，一些人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浸淫于租界的一些国人中的开明人士，也时时能够比较中国与列强的差距有多大，明白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哪怕与列强中的一个国家全面开战，也很难有战而胜之的希望。

“刘坤一、张之洞们，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人。当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设立后，朝廷当然要派遣各级官员到制造局工作。而他们许多是